

生活方式研究评述

王 雅 林

一、生活方式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种理论、一个学科或某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代往往有着不同的命运。它们的兴起、受人们关注的状况取决于不同的国情和社会需要的程度。在我国,社会学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也是这样。

生活方式问题,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并不占优势地位。在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中,“生活方式”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也没有取得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学被停止了27年之久,更无从谈到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不但如此,就是在其它学科中对它的研究也属空白。不但在科学园地中没有确立应有的地位,即使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没有对其谈论的合法性。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生活方式这个词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提到它,但在各类辞书中,却寻找不到它的痕迹。这表明那时人们还没有承认它作为科学范畴或概念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种现象是,过去人们虽然提到这个词,但在表述其正面意思时使用的不多,常常是在表述其反面的意思时才使用它,如经常说“某人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似乎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活方式注定是个反派角色,是不该正面谈论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方式研究一下子就被提了出来,社会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差不多同社会学重建的时间一样长。最早提出这些研究课题的是我国的一些资深学者。如,于光远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一文,以及在同期罗元铮、杜任之等人发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生活方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只是经过改革开放短短的几年时间,生活方式就由一直被歧视,被冷落和只配扮演“反派角色”的字

眼而成为走红的“明星”,堂堂正正地步入了社会科学的殿堂,成为一个时期中社会科学各领域争相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当然也更成为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学科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不但收入了“生活方式”条目,同时在该卷中还确立了“生活方式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地位。另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中,对于生活方式的应用研究也一直持续着。

那么,在我国是什么力量促使生活方式研究的命运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应当说,生活方式研究的命运同社会学学科之所以在中国能得以恢复的社会背景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我国的社会运行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的产物。

首先,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和极“左”思潮的破除,承认了人们谈论生活、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事,但联想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极“左”的提法,足以显示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进步的标志。

其次,改革开放以后,由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行政计划经济向商品和市场经济的转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国门之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及示范效应等复杂社会条件所决定,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价值真空、价值失范、价值评价的双重标准以及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较高期望同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之间形成的差距等等。这些都使政府的决策面临更多的两难选择,迫切需要通过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研究,真实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并从理论上做出说明和回答,解决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活的实

际变化上,社会学作为一门通过人们的社会行动揭示社会结构和过程规律性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正好得以发挥其优势。所以早在80年代初期,在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上,就出现了较有份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再次,由于我国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宏观社会发展和变迁上也急需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加以指导。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自然把生活方式问题提到一个战略地位上来。关于这一点,在于光远《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一文的后记中谈得很清楚。他说:“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必须重视的一些问题。”“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发展战略,不应该强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而应该强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和该国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成比例,产品的生产结构、分配结构和生活方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除了产品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之外,还必须很好地研究生活方式问题。我认为,作为我们奋斗目标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的确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一种。”

类似的观点,在罗元铮的文章中也表述得很清楚。他认为,“生活方式是社会组织模式的产物,”我们“所要建立的只能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但又具有中国特点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生活方式问题立即成为社会学学科视野范围内的研究领域,绝非人为的、偶然因素所致,它确实是时代提出的需要,而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学科特有的优势,正好为研究时代提出的这一课题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和手段。

二、生活方式研究的主要历程

对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在我国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1年至1984年10月,为生活方式研究的起步阶段。如上所说,在我国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是由几位资深学者首先倡导的。其中,杜任之在发表于1982年第1期《社会》杂志上的《谈谈生活方式》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活方式是社会研究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时期发表生活方式研究成果的还有王锐生、王玉波、王雅林等人。费孝通主编的《社会学

概论》也论述了生活方式社会变迁问题。1984年8月,《文汇报》还辟专栏开展了生活方式问题讨论。该阶段生活方式主要涉及以下内容:1. 阐述生活方式研究的巨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积极倡导生活方式的研究;2. 探讨有关生活方式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问题;3. 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生活方式的地位和发展模式问题,并对如何开展生活方式研究提出设想;4. 从理论上开始对以往在极“左”思潮下否定人们追求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指出不能“把吃得好、穿得好归结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把“安贫守穷”归结为“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生活方式”。^①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至1987年底,该阶段为生活方式研究热潮迭起的阶段。生活方式研究之所以出现“热”,直接驱动因素是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任务,这是在国家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生活方式建构问题。在此之后吸引了更多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参加对生活方式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其中社会学工作者从特定的理论视角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探讨的课题是:生活方式概念的涵义、结构、构成要素及生活方式社会学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及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问题;对消费、闲暇、家庭和日常生活、劳动、交往等生活方式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对青年、妇女、中年知识分子、老年、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城市和农村不同社区的生活方式,都做了大量应用研究,为决策机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咨询意见。该阶段生活方式社会学研究成果数量颇多。生活方式研究成果发表量较多的学术刊物有《社会学研究》。该刊从1986年创刊号伊始就发表了生活方式研究成果,在此之后,多次开辟生活方式研究专栏,是国内发表生活方式研究成果最多的社会学学术刊物。除此之外还有《学习与探索》、《天津社会科学》等。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邓伟志著的《生活的觉醒》,王玉波、王辉、潘允康合著的《生活方式》,刘崇顺著的《新时代与生活方式》,王雅林主编论文集《变革中的生活方式》和资料集《生活方式研究》,黄德兴等人主编的译文集

^① 逝川,《“资产阶级生活公式”析》,《文汇报》1984年8月22日。

《现时代与生活方式》等。该阶段召开的全国性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有：1984年12月由《中国妇女》杂志社于北京召开的“妇女与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1985年9月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学习与探索》杂志社于哈尔滨联合召开的“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并出版《生活的学问》论文集；1987年10月在天津市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单位发起召开的“社会改革与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出版《现代生活思考》会议论文集。

第三阶段：1988年至1992年，为生活方式研究转入“正常”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阶段。如果说在过去的几年中生活方式研究表现为“过热”的话，那么到了1988年以后生活方式研究“热”开始降温，继续从事生活方式研究的人数和发表的成果数量都大为减少。但从社会学学科自身较薄弱的队伍的实际状况看，这倒属于正常现象。在该阶段，继续从事生活方式研究的学者在总结前几年研究经验和做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则更扎实、更深入。该时期，社会学者关注的问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活方式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生活方式的模式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生活方式指标体系研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生活风格概念的相关研究；现代生活方式和个性发展；以及从社会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等。1988年8月在伊春市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生活方式被列入重点议题之一。1988年以后出版的生活方式理论专著有王玉波、王雅林、王锐生合著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生活方式论》、王伟光主编的《社会生活方式论》，国家“七五”重点课题“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其中王雅林等主编的专著性成果有《生活方式概论》、《闲暇社会学——对我国城镇居民闲暇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等。

第四阶段：为1993年以来。由于我国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以及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再次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任务，特别是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建构提出许多新问题的实际，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研究市场经济对生活方式影响的性质、作用机制和新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一些省、市社会学学

术组织召开了有关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方式社会问题的研讨会，有的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有关专著。

80年代以来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颇丰。据粗略统计，十多年的时间中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上千篇，专著十余部。

三、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

生活方式概括的是复杂、多层次的社会现象，因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是颇有成绩的，探讨了大量的理论问题，总的估价是初步形成了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论范畴体系，生活方式作为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得到了确认。兹介绍以下主要理论问题：

1. 关于生活方式的涵义及相关概念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生活方式是个回答人们“怎样生活”的概念，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文化模式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运用社会环境提供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活动方式、“配置方式”。《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对生活方式作了如下定义性表述：“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这是比较严整的科学表述。但是，由于人们对“生活”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因而生活方式概念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一种意思认为，人们的生活领域应当涵盖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生活、宗教生活等广阔领域，因而人们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活动应当包括上面所指这些“一切”方面。按照对生活含义的这种理解，形成了生活方式的广义概念。第二种意见是主要把“生活”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如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家庭里的生活活动等，或简单地限指“衣、食、住、行、乐”领域。按照这种理解，则形成了生活方式的狭义概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理解是，仅指由个人情趣、爱好、嗜好、价值取向决定的生活行为的独特表现形式和特殊的生活习惯、风度、气质等等。但多数人都认为，最后这种概念的使用应仅限于特定的情景之中。关于生活方式的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显然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科学的界定，“生活”、“生活需要”显然不能仅限于日常生活领域。比如，如果一个社会虽然能提供满足人们衣食住行乐的条件，但却不能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提供合理的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等

条件,那么这个社会的发育也不能说是很健全的。但日常生活又确实是人们对生活方式研究的传统,重要领域,因而在实际地对社会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又可依据不同的情况兼顾两种涵义的使用。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界定了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活风格、生活标准、生活模式、生活制度等概念的含义及生活方式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生活方式概念体系。

2. 关于生活方式范畴的结构和特征

学者们普遍认为,生活方式是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概念。首先,从结构上看,生活方式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构成要素:生活活动条件、生活活动主体和生活活动形式。生活活动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宏观社会条件和微观社会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某些人、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形成的社会条件时,只能是指那些同主体的活动发生直接互动关系的“客体要素”条件,而不是指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条件。生活活动主体在生活方式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其主体可分个人、群体(大至阶级、民族等大群体,小至家庭等小型群体)。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因而制导主体生活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观。除此之外,社会心理、个人心理直至生理因素都会对生活活动主体的活动方式发生程度不同的调节作用。而生活活动条件和生活活动主体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外显为一定的生活活动状态、模式或样式,从而使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的生活方式具有可见性和固定性的特点,人们正是通过以这种外显的生活活动形式为标志判断一种生活方式的优劣的。

生活方式概念的复杂性表现为它具有如下特点:

(1)生活方式既是一个多层次的、概括程度很高的综合性概念,又是通过一个个人的生动、具体生活活动形式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具体性概念,体现为综合性和具体性的统一。(2)生活方式属于文化现象,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特点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同时又总是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异,体现为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统一。(3)生活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属性,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性;同时它又具有超越社会形态性质的非社会形态属性和全人类性,体现为社会形态属性和全人类性的统一。(4)生活方式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条件的规定性;同时又离不开对生活资源利用性质和满足主体生活需要价值大小的质的方面规定性的测定,体现为质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

3. 关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一些学者认为,两者范畴属性的区别是:1. 生产方式表述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客观制约性,属于客体性范畴;而生活方式是主体满足自身需求所采取的活动方式,属于主体性范畴;2. 生产方式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而生活方式所涉及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3. 对生产方式主要是从社会形态层面进行研究,而对生活方式却可以从社会、群体、个人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者密切相关,同属人类的两大基本活动方式。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它制约和决定着一定类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即人们的生活活动离不开既定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社会客观条件;而生活方式则是在既定的社会客观条件规定的范围内,通过人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的满足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它体现为一个社会进行生产的价值目标。一个社会越进步越发达,社会生产越是作为前提而存在,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越大,生活方式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也就越重要。从社会宏观变迁的角度看,在自然经济社会、工业社会和未来的信息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经历或将经历“未分离—分离—再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变迁过程。

4. 关于生活方式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

这是生活方式研究一开始就遇到的问题。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道路离不开该国的国情特点和民族文化传统,否则就会失去根本和丧失在各民族生活方式多样性中的地位。特别是当人类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世界的经济、文化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文化发展上看,“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模式开始被打破,代之以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全球化,东方文化、中华文化开始显示独有的魅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建构更应保持民族特色,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建构新型社会生活方式所需要的足够养份。但是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文明大道。从根本上说,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就是要获得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建立全球开放的、一体化的经济。产品塑造生活方式。随着各国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也必将形成全球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学者奈特比特在《90 年代世界发展大趋势》

一书中,把“生活方式世界化与文化形式民族化”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之一加以表述,是很有道理的。

5. 关于对我国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目标的表述

在如何表述我国所要建构的新型社会生活方式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常用的有“现代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在这方面尚存在一些争论。但我们认为,这几种表述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使用“现代生活方式”概念时,强调的是生活方式同现代生产力和现代文明的联系,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建构必须以实现现代化为根本条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是统帅一切的总体目标。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方式”自然也应体现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概念强调的是我们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性质。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证,又是调整社会关系、实现现代生活方式健康发展的制衡器。整体系统的性质决定子系统的性质“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概念既强调的是我国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方向,又内在包含现代生活方式的含义。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议在现代工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使用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概念时,强调的是我们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要求。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是文明、健康、科学的,那么,这种生活方式自然应当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社会主义道路又可以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给生活方式带来的严重社会弊病。因此,在通常条件下,我们又可以用“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来表述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目标。

四、生活方式的应用研究

如第一部分所述,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国的勃兴,首先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因此,8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在对生活方式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也围绕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实际,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应用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社会学者在生活方式方面研究所取得的应用研究成果,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取得研究成果的重要领域之一。生活方式的应用研究成果包括:

1. 描述、分析、预测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趋势。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社会转型加速期。同历史上的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一样,生活方式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兆和先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令世人惊奇的变化。而社会学学者参与和追踪了这个变革过程,从多层面、多角度对变革中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比如早在1985年社会学学者就用“七个转化”概括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趋势,即:中国社会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从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从物质型向文化型转化;从标准型向多样型转化;从耐久型向更新型转化;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从室内型向室外型转化。^①在这以后社会学学者不断追踪和揭示了每一发展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向。

2. 对城市或农村生活方式状况组织实施了大型综合的社会调查。这些研究既包括对大中城市生活方式的大型调查研究,又包括对小城市和城镇生活方式的大型调查研究;既有对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生活方式的大型调查研究,又有对中西部经济不够发达地区农村生活方式的大型调查研究。例如,在城市进行了大型调查的有天津社科院的千户居民调查,上海社科院的生活质量调查,辽宁社科院的生活意愿调查,黑龙江社科院的九城镇生活方式综合调查等。在农村,有江苏省社科院吴大声、邹农俭、叶南客等人在苏南地区进行的社会调查等。我国过去很少有完整地反映人民生活方式状况的社会统计资料,所以这些社会调查具有开拓和填补空白的性质。它们不但记录了一个时期人民生活方式的实际状况,而且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对于这些资料的开发工作,只能随着时间的久远越具有特殊的开发价值。

3. 对不同领域生活方式社会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生活方式的应用研究,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问题,其中较有成绩的领域有:家庭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家务劳动等。比如,由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广东《家庭》杂志社在1991年联合进行的“城市居民家庭网络和生活质量”调查基础上合著而成的《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一书,就对改革开放以来从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向现代的家庭生活方式转变的具体形态做了全面考察,对其中的许多社会问题提出了具

^① 参见刘达临:《应该欢迎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人民日报》1985年1月23日第4版。

有启迪意义的解决方案。^①王雅林于1980—1981年在黑龙江省若干城市进行了大型抽样调查,通过大量事实对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的繁重状况做了全面的描述,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左”的路线下人民生活领域所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为政府部门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决策依据。8年后又围绕同一问题进行了追踪研究,又从家务劳动这一特定角度对新形势下生活方式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解决新的社会问题的咨询建议。^②

4. 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考察。在已发表的生活方式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是对我国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生活方式状况进行考察研究的,其涉及范围之广,是其它社会学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所少见的。比如,这些研究既涉及到不同的年龄、性别群体的生活方式,又涵盖了当代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职业群体的生活方式。其中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个体劳动者;干部、大学生、中学生等等。同时既有对社会主导生活方式的研究,又有对反文化、犯罪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研究;既有对汉族生活方式的研究,又有对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中外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群体在生活方式变革的共同趋势下,其变革步调呈多样性、差异性和非同步性的特点,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5. 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建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不断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社会学学者对生活方式的研究论著中,有不少涉及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建构问题。如分析了商品和市场经济对生活方式进步的“杠杆”作用及其影响的“双刃剑”性质,分析和具体考察了市场条件下容易出现的社会病态现象;以及如何从社会发展战略抉择的高度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文发展的关系,以减少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生活方式的“社会痛苦代价”问题。

6. 对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了研究。一些研究者通过国情分析指出,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同“早发”国家的现代化相比,具有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我国今后的发展在人口、生态、资源、能源、粮食上都将面临相当严峻的问题。因此,从生活方式研究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高消耗资源、高消费水平”的传统发展路子。在国民生活

方式的模式选择上,只能建立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在充分发挥“两个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后发”优势)的基础上,以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消耗,在生产发展所能提供的生活水平的范围内,走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的路子。

7. 对于建立生活方式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在这方面,社会学者既进行了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又进行了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实际制定工作。一些学者指出,生活方式指标体系是用以说明和描述生活方式总体特征和发展水平的指标群,是社会指标体系的亚类型,对认识生活方式现状和变迁趋势具有重要功能。因此,生活方式指标体系的建立应体现客观性、概括性、有序性和国际可比性的要求。指标体系的构成框架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揭示生活活动主体活动和需求满足状况的主观指标,二是揭示生活活动条件的客观指标。在操作性指标的设计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朱庆芳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张琢在对国情分析和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由15个方面组成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其中就包括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③

五、问题与建议

1. 存在问题

我国社会学者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在学科理论空白基础上起步的。因此社会学在这方面取得上述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社会学处于刚刚恢复的阶段,研究队伍尚属弱小,加上长期处于闭锁状态,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十分匮乏等因素,所以社会学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应用研究上看都明显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理论研究缺少深度,尚未准确地把握社会学特定的学科视角。

生活方式社会学来到中国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实践推动的结果。由于过去长期禁绝人们对合理生活需要的追求,改革开放后闸门初开,加之政府的提倡,在这种情况下,便很快形成一个生活方式研究热。但

^① 参见潘久康、柳明主编,关颖、郑晨副主编:《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参见王雅林:《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参见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第282—3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种热却具有趋时性、突发性的特点。一时间投入生活方式研究的人数虽多,但真正做艰苦理论探求工作的却不多,加之缺少理论借鉴,因而当人们研究生活方式问题时,很容易在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用语水平上使用和界定生活方式概念。另外,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具有浅层结构快于深层结构的特点,因而一些研究者容易只注意对生活方式的非本质浅层结构方面的描述,或者把浅层结构方面当成生活方式的全部内涵。这样,势必出现把生活方式视为只表征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特征的狭小概念,而不是看成一个由社会环境系统制约和价值观制导的回答“怎样生活”的概念。同时,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也做得不够。在生活方式研究初期,一些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些原苏联、东欧国家和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有关生活方式研究的译文,其中以原苏联的生活方式论著为多。这些论著虽有借鉴作用,但其空泛化、教条化和概念化的研究倾向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生活方式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翻译介绍过来的国外研究成果也是多学科的。但如何把“引进”的成果嫁接在社会学这棵“树”上,由于当时我国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尚不完善,社会学对生活方式研究的特有学科视角和特点是什么,也就还不能做到有准确把握。当然在生活方式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中国化上,则更是一个一时难以完成的任务了。

其次,理论研究同经验研究结合不够,经验研究缺少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力度。

在我国,由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是从经验研究起步的,在整个十余年的时间中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以经验研究为多。其中不乏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力作。但从总体上看,理论研究薄弱同经验研究成果缺少反映现实生活的力度的现象是并存的。各种社会调查虽然搞了不少,但真正象老一代社会学者那样艰苦扎实地深入到调查对象中去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者不多。而且一些研究者在从事社会调查之前缺少必要的理论知识,或者在研究中采取理论与经验研究相割裂的做法,致使经验研究缺少理论指导,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模糊不清,自然也就建立不起对被考察对象进行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之间的联系。因此,一些应用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简单描述水平上。反映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不够。在生活方式研究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和尺度,所分析的社会事实缺少可比性。同时,如果说在经验研究的方法论上主要遵从的是社会事实范式的话,那么在

调查方法上往往采取单一的问卷调查法。任何一种调查方法都有其特殊的功效,同时也存在其局限性。对于问卷法来说也是如此,因此一项社会调查往往需要数种方法并用,或选择最适宜的一种方法。

再次,在生活方式的研究中,预测、理论导向功能发挥得不够。

通过研究人们的具体社会行动探索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从而对社会的前景和趋势做出科学预测,以达到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目的,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咨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功能。生活方式研究既然是社会实践提出的需要,那么就应发挥这种功能。如果说社会学者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在描述和分析功能上尚存在一些不足的话,那么在预测、理论导向功能上的不足是更为明显的。从社会学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来看,表现为前“热”后冷,对8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进程反映得要少得多。从总体上看,生活方式的研究对我国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的趋势和本质的揭示不够,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构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重大问题的研究,社会学者的反应稍显迟缓。由于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导向功能较弱,因而一些社会学研究成果发表后,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不大。

2. 前瞻和建议

我们即将跨进21世纪。无论从世界的还是从我国的未来发展大趋势上看,未来的发展都将是一个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文因素调适力量的时代。而生活方式便属于社会发展的人文因素方面,因此,在总结我国已有的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学者继续加强生活方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加强生活方式研究的学科化、本土化建设。十几年来,社会学对生活方式的研究都大体存在一个理论体系从国外向国内、从其它学科向社会学的双重移植过程。这些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对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已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体系。但是这种理论的移植要真正同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同中国国情实际取得认同,应做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为此今后仍需全面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和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国情特点的把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于生活方式问题进行研究的社会学特有的理论、概念、方法体系。

(2)提高社会学工作者参与社会变革的深度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应用性、现实性很强的课题,社会学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要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除了注意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外,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学工作者参与社会变革的深度。社会学工作者要脚踏实地、作风扎实,贴近生活,直接参与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回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这既是社会学理论为伟大的社会变革服务的途径,又是发展自身学科理论的有效途径。二是实现研究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相当多。如经验研究中的多重范式问题,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结合问题,调查方法的多样化、精密化问题,调查、统计手段的现代化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会大大提高生活方式的应用研究水平。

(3)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方式社会问题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给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带来新的冲击和震荡。市场经济将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基本走向。而市场经济环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社会学要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社会问题,并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这是最紧迫和最有意义的课题。社会学者要对每个时期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态势做出科学的评估,对基本走向做出预测,同时能够对我国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模式、发展机制等问题做出科学论证。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工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范广伟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已连续 7 年下降

中国大陆人口自 1988 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都已连续 7 年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持续下降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近(1.9),远远低于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4.4)。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人口控制和发展的独特规律。正因为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计划生育工作,今后仍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继续有效地、合理地控制人口增长,那末,在本世纪把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总人口控制在 13 亿内是做得到的,使下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的极峰不超过 16 亿也有望。

1987 年以来中国大陆人口数及增长量

年 份	人口数(万)	绝对增长量(万)	自然增长率(%)
1987	109300	1793	16.61
1988	111026	1726	15.73
1989	112704	1678	15.04
1990	114333	1629	14.39
1991	115823	1490	12.98
1992	117171	1348	11.60
1993	118517	1346	11.45
1994	119850	1333	11.21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资料汇编。

(张 琢)